

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 王奇生 金以林 著

即使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的人，
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个「非凡」之人！



在这里，蒋介石回归本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丛刊

山西

失去

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 王奇生 金以林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 / 汪朝光, 王奇生, 金以林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03-07666-7

I. ①天… II. ①汪… ②王… ③金… III. ①蒋介石 (1887~1975) —人物研究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4196号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

著 者：汪朝光 王奇生 金以林

责任编辑：李鑫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10-62164516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20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7666-7

定 价：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天下得失

最近若干年以来，国内各行各业热衷于与国际“接轨”，历史学亦不能自外于这样的趋势。受西方史学潮流的影响，政治史被认为“过时”了，“英雄史观”更是备受冷落甚至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史、文化史等受热捧，“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受重视。其实，中国的历史自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史学亦大可不必与西方亦步亦趋。如西方政治早已上轨道，在轨道上跑的政治固然很好，但描述起来难免因其“无事”而显“乏味”。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既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又没有完全走上新的轨道，称得上是“乱世”。“乱世”对历史学家更具有挑战性。这一时期，战争、革命、内战、外战、政变、民变，一切都在剧变中，一切都在动荡中，充满偶然，充满传奇，充满戏剧性，还具有那种不在轨道中的不可预测性。经济基础不见有何大的变动，而上层建筑却是风雷激荡。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想避开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之类的老话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个性特质、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可能决定和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普罗大众的历史固然不可忽视，“精英”“领袖”更不可能被历史边缘化。撇开蒋介石讲不清民国史，撇开毛泽东也讲不清共和国史。

应该说，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蒋介石研究，最近几年才刚刚起步。其间的原因很多，“政治”便是其中不能忽视的因素，两岸皆然。好在随着历史的流逝，“政治”的因素在逐渐减弱，而历史资料的大量开放，则为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蒋介石日记的公布，便是有关蒋介石的学术研究得以开展的不可忽略的要因之一。持续五十多年不间断地写日记，记人论事并将之留存，可能是蒋介石一生中与其他领袖人物相比的特异之处，而后来的研究者，无论是褒他贬他、颂他骂他，都不可能无视他的日记。有人说，蒋介石日记是只写给自己看的。一般而言，日记当然是写给写者自己看的，不过也不尽然，无意之中甚或是有意写给别人看的日记也未必是个别，尤其是那些“大人物”的日记，在写作之时，他们已经考虑到通过日记维护其身后名了，其所谓真实性，有时实在是需要打个大大折扣的。其实，早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蒋就声称：要想知道事件的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吧。据罗家伦回忆，南京政府初期，蒋拿出全部日记和他商量，打算出版。^{〔1〕}其后，蒋改变计划，将早年日记交给他的老师毛思诚整理成年谱，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为名出版了。此后，蒋令人继续以其日记为基础编辑《事略稿本》。即使在激烈的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于政务繁重军务倥偬之际还抽出大量时间认真细致地逐卷审阅和修改其数量庞大的《事略稿本》。可见他如何重视其身后形象的建构和维护，也可见看过蒋日记的远不只蒋一个人。既然如此，蒋介石在写日记时，对于何者可写何者不可写，对于可写者写到什么地步，当然是有他自己的考虑。作为领袖人物，他关心的身后名首先还是“政治”，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蒋为什么可以在日记里不惜笔墨记下他年轻时做过的一些荒唐事，而又对那些有涉“政治性”的事件不时惜墨如金。

正因为此，阅读蒋的日记，不妨“于不疑处有疑”（胡适语），不

〔1〕罗家伦：《蒋的性格言论和行动》，见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9年，第25页。

仅要看他记了什么，更要广泛对照其他史料，琢磨他“隐”了什么，琢磨那些他没有明言或言外之意，琢磨他有些事按常情该记而为何“漏”记，有些事按常情该详记而为何略记。质言之，即便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也未必是真实的历史记载，更不必说那些写的时候就有意留给后人看的日记了。当然，任何人记日记都是有选择性的记述。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强烈的情绪宣泄，这在政治家的日记中是不多见的。亦因此，蒋在日记中常有一些极端化的言词，诸如最恨最爱、最悲最喜之类的表述。这一类表述，最见其个性、心态，读来也富有趣味，但如果离开蒋日记的整体语境和表达习惯，尤其是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而断章取义地引用，是有可能歪曲其原义的。

研究蒋介石，当然难免对蒋介石的评价。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是豪杰、圣贤、革命领袖。其实这三者是难以兼容的。别的不说，无论做草莽豪杰还是做革命领袖，都难免趋于激进、激烈、暴力乃至不择手段，而要做中国传统式圣贤，就应该温良恭俭让，走中庸之道。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大量修身养性、自我反思、自我节制的记载，相信不全是“作秀”。再说，要能持续几十年“作秀”，或许也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作秀”了。一个位居权力顶端而缺乏外在制约的人，最易无所顾忌而走极端，而蒋之“独裁”虽无所不在却又不无边界，其以“圣贤”自待的修身养性，未尝没有起到“自我节制”的功用。比如对付“异端”分子，蒋氏早年采“暗杀”手段，也许可解读为还没到肆无忌惮的程度。蒋是一个缺乏浪漫、幻想和激情的人，其性格偏于保守、中庸，其实浪漫、幻想和激情澎湃为革命家最爱而为政治家最忌，或许这又可以解读为，蒋氏的政治家个性远胜于其革命家气质。

、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名义上的帝制不存，实际上的皇帝仍有。袁世凯当政的时间太短，其独裁权威尚未得充分显露。而蒋介石要算是后皇权时代的“第一人”。若说抗战以前还有胡汉民、汪精卫等对手掣肘和地方实力派挑战的话，那么，抗战爆发以后，在民族主义的强大感

召下，蒋介石的权势声威应该说是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古语称“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之”；又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蒋介石的“天下”既从“马上”得之，也从“马上”失之；既顺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在短短22年的时间里，这样的一得一失，先得后失，竟在蒋介石一身一生中“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绝无仅有吧。这是何等的生命体验？什么样的人能承受这样巨大的人生起伏？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还能“寿终正寝”。这样的“淡定”，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的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个“非凡”之人吧。

对于这样一个“非凡”之人，要想简单来一个“盖棺”定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有关的学术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全面之际。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非凡”之人，因其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及其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影响力，势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历史学者们持续关注 and 讨论的对象。

本书是几位作者合作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研究若干篇章的结集，利用蒋介石日记，也利用其他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对蒋介石的一生做了一个初步的描画，也许可以称为几位作者的尝试。至于对蒋介石复杂一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蒋介石客观而求实的历史评价，远非几位作者初步的研究所可担当，或许还有待于学界将来的不断努力吧。

目 录

- 001 第一章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
- 021 第二章 屡仆屡起
- 051 第三章 关键的一年
- 078 第四章 从倚重元老到闲置元老
- 111 第五章 地缘纠葛与派系纷争
- 139 第六章 削藩安内：昆明事变
- 165 第七章 家国亲疏：与宋子文、孔祥熙的关系
- 198 第八章 一党训政下的多党合作

- 227 第九章 挽救危局与“戡乱动员”
- 245 第十章 最后的改革：金圆券发行
- 286 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阅读史

第一章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若是平民百姓，他的性格仅决定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若是国家元首，他的性格很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个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国家，国家元首的性格对政治的影响尤其大。

1927 - 1949年间的中国政局，既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也是蒋介石一人独裁。蒋介石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政治家，其鲜明的个性特质势必影响到国家政治。但学界很少对蒋介石的个性特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进行学理探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资料的欠缺。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开放，为我们考察蒋介石的个性特质，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一 疏父恋母

每个人个性特质的形成，与其早年成长经历，有相当的关系。蒋介石九岁（虚岁，下同）丧父，十五岁初婚，二十三岁得子，三十五岁母亲去世。这样的早年经历，在蒋介石的同时代人中，其实并不罕见。然而，蒋介石对其早年经历的忆述，却非同寻常。

对于父亲，蒋介石很少提及，除了写过一篇《墓志铭》外，数十

年间的公开言论和私密日记中均不见提及。直到六十岁时，日记中留下简短数字：先考之严厉，“不忍言也”^{〔1〕}。在蒋的记忆中，“严厉”似乎成为他对父亲的唯一存念。^{〔2〕}蒋是在回忆其早年塾师任介眉时，兼带提及父亲的。在六十岁的蒋介石笔下，任介眉被描述为一个残忍惨酷的“毒魔”。由此及彼而联想到父亲，竟是“不忍言”三字，似有一腔怨恨尽在不言中，与对“毒魔”塾师的记忆难分伯仲，以至于晚年仍未能释怀。也由于蒋对其父亲几近失忆般的隐讳，数十年来，外间因不明真相而有各种揣测和谣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之下，蒋对母亲的情感，无论母亲生前，还是母亲死后，依恋之深，感怀之切，且持续数十年形诸笔墨的深情表达，连他本人也自认异乎寻常。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3〕}中，十三岁条目下有这样的记载：“夏月放假归，入门，见王太夫人，未开言，即嚎啕大哭，越时声益凄。自此每遇外出，辄泪眼尽赤，哀动邻舍。……远离至一二十里以外，犹暗自哽咽。”^{〔4〕}情感之丰沛与脆弱，即使同龄女孩也未必如此。1930年12月4日日记中，蒋介石自陈：“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蒋介石结婚虽早，“断乳”甚晚，二十余岁犹如此恋母，实属罕见。对于这一“天性”，蒋也自以为异。甚至与宋美龄结婚后，年愈四十的蒋介石仍自感“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婚后三年，蒋自承：“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澹惨恼，必不愿与妻乐

〔1〕《蒋介石日记》，1946年10月2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2〕蒋介石的祖父在其父亲之前一年去世。在蒋的日记中，称述其祖父对他“钟爱异常”（《蒋介石日记》，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

〔3〕《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实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之原稿。与《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相比，内容基本相同，因保留了蒋介石删改的痕迹（加注了说明），因而更具史料价值，故此处不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而引《蒋介石年谱初稿》。文内提及毛思诚所编年谱，除特别注明者外，即指《蒋介石年谱初稿》。

〔4〕《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页。

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1〕}吾人阅读蒋的日记，对其“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一点，感受至深。

据蒋称，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母亲和外祖母陪伴下度过的。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外祖母与他们孤儿寡母“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中正课余假归，侍外王母与先妣于冬日爱堂中，中正读，先妣织，外王母念佛，机声梵音，与书句相间如唱和。”^{〔2〕}在两位寡妇（外祖母四十六岁守寡，母亲三十二岁守寡）抚育、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其性格中难免养成某些女性化倾向，如阴柔、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整洁、爱操劳细事^{〔3〕}等。

与蒋介石的“恋母情结”比，其母亲的“寡母情结”同样鲜明。女子失去丈夫成为寡母之后，为了弥补生理和精神上的空虚，往往从儿子（尤其是长子）身上寻求替代性的虚拟满足。如果寡母情结过于强烈，一般会有极力支配甚至占有儿子的行为产生。据蒋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回忆，蒋的原配毛福梅曾告诉她，蒋毛初婚之际，感情尚好，但蒋母对小夫妻的私密相处无法容忍。^{〔4〕}在十五岁的蒋介石身边，三十八岁的寡母与二十岁的妻子几乎成为情敌。

蒋介石谈到，在他一生的哭泣史上，有过三次最痛彻、最伤悲之“泣”：一次是前面提到的十三岁回家之泣，一次是十五岁成婚之泣，还有一次是三十五岁母丧之泣。蒋回忆说：“余于十五岁成婚之日，俗礼必奉茶于亲属，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闻母泣之声，余乃

〔1〕《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4日。

〔2〕《外王父母传》，《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2页。

〔3〕《蒋介石日记》1937年年底杂录：一生短处缺点与病源，其中之一，不注重提纲挈领，细事操劳过多。

〔4〕毛福梅回忆：“介石每每同我在房内说话或笑出声音来的时候，这就使王太夫人怒不可遏。”以至于毛氏只能整天保持缄默，“渐渐完全避免在房里同他公开直接谈话。”“我毫无办法，只有为我全然无助的苦况，暗中哭泣，以致很长一段时日中，我患了忧郁症。为要逃避那围困着我，使我无可忍的苦痛，我就越来越转求佛爷给我慰藉。”石一流：《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蒋介石第三夫人陈洁如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6—77页。

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之，母乃泣训曰：余自汝父逝世，教养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余有多少伤心事，愿汝成年立业，不忘为母者今日教养汝之苦心也。余闻此痛泣，更难成声。呜呼，寡母伤心事，谁能知之。”^{〔1〕} 儿子新婚大喜，作为寡母，感怀抚孤之苦自属难免，若一味伤感，恐怕潜意识层面难免有儿子即将被别的女人夺去之隐忧。

前后四位妻室中，蒋和前两位的关系均不融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婆媳关系紧张。^{〔2〕} 在孤儿的心中，寡母的地位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故当母亲与妻妾发生冲突时，蒋总是一味地捍卫母亲，痛责妻妾。

蒋母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蒋母前夫不到三十六岁就死了，再嫁蒋父作填房时，年仅二十三岁，小蒋父二十二岁。对于父母关系，未见蒋有直接的记述。从间接的资料推断，蒋父母关系很可能不融洽。蒋在1923年12月撰写的《慈庵记》中提到，母亲生前一再嘱咐他：“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理由是同穴要开启父墓，担心“重惊尔父之灵”。“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箦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3〕} 夫妻生同衾，死同穴，自古常然。夫妻除非同死，否则后死者总难免“重惊”先死者。蒋母既深知“俗礼”，却又如此坚拒与丈夫同穴，恐怕不是顾虑“重惊尔父之灵”所能解释得通。有学者认为，蒋母不愿与夫合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蒋母在蒋父

〔1〕《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4日。

〔2〕兹引1920年蒋介石有关姚冶诚的几则日记：6月16日：“母亲来教，言及冶诚举动之凶狠，殊令发指，余若再无决心断绝关系，是诚冷血之流也。”6月22日：“母亲谴〔虐〕疾复发，寒热大作，见之心慌，我不孝之罪大矣，为始不慎，置此悍妾，竟致母亲动气担忧，病重如此，可不悔恨乎，……母病沉重，妾悍如故，思之痛苦，无有过于此者也。”6月24日：“此次冶诚作孽，痛苦极矣。……冶诚又来讨气，彼妇凶悍，忍〔任〕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妾之罪大矣，悔恨何其有极，冶诚去后，忧愁愤闷，抑郁牢骚，自出世以来，未有如此之甚也，痛苦极矣。”

〔3〕蒋介石：《慈庵记》，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1978年，卷一，第64页。

夫人中排名第三，如与蒋父“同穴”，就得靠边站了。^{〔1〕}这一说法，也不无勉强。生前既已甘为填房，死后未必那么在意靠边站。另据当年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镛回忆，蒋介石曾建议其母亲，将父坟迁葬，单独与母同穴，但其母亲也不愿意。^{〔2〕}蒋母如此坚拒与夫同穴，合乎情理的推断，应是夫妻生前感情严重不洽。

而蒋终身称颂其母，而闭口不谈其父，甚至对父亲长怀恨意，未必全因父亲“严厉”，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亲影响。在此不妨拿胡适作一对比。胡适四岁丧父，同样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胡适的母亲，为幼年胡适建构了一个“完人”和“圣贤”般的父亲形象。小胡适每天起床时，得先听慈母一顿“晨训”，时常讲父亲生前的“种种好处”，嘱他将来踏上“父亲的脚步”，做一个“完全的人”。^{〔3〕}胡母固然是“教子义方”，恐怕也是自己情感的补偿。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都难免将这种爱恨传递给子女。蒋母与蒋父感情不洽，难免贬损蒋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蒋介石不仅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对父亲、父权的信仰。

二 不孝与至孝

1921年母亲去世后，蒋即自律：“以后无论阴历阳历，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物荤，不动气，不御色，以为终身自惩自戒，冀减不孝之罪于万一。”并定自己生辰，也照例食素（后改为早餐食素）。^{〔4〕}不仅如此，每逢母亲的生辰忌日、自己诞辰以及除夕之日等，蒋常有怀母的文字。如1931年12月14日：“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慈母诞

〔1〕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第10-11页。

〔2〕张明镛：《蒋介石在溪口》，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73辑，第110页。

〔3〕胡适：《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47年，第56页。

〔4〕《蒋介石日记》，1922年6月4日、11月3日。

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933年11月2日：“今日为旧历九月十五日，即为余四十七岁之诞辰，劬劳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日趋于败亡，将何以慰慈灵，经儿留俄，回家无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进念先妣，终日不已，而于三餐，尤为心切，母子之情，至久而益切，有父母在生之时，为子者可不孝乎？如中正者则悔之晚矣。”

每当心情烦闷或遭遇挫折时，蒋也常会思念母亲。1929年1月28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龄——作者注）往吴淞游行，闻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闷。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1929年1月30日：“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愁闷忧郁为近来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呜呼！”至于触景生情的怀念，蒋日记中常见记载。如1931年4月26日：“夜半闻子规之声，而忆吾母起床喂蚕时，呜呼！不能复见矣。”1931年12月3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

蒋思念母亲，每每以“不孝”自谴。这样一种自我痛愧，粗看似是宋明理学的一套表面文章，细究其语境并联想蒋的早年经历，感觉应是其真情表白。少年蒋介石以顽劣著称。顽劣的孩子难免令父母超常操心。蒋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自诉从小“冥玩不灵”：“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焙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忧。及六岁就学，玩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1〕}

〔1〕蒋介石：《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一，第41-43页。

蒋介石原名瑞元。溪口乡间流传着“瑞元无赖”的种种故事，已难考实。^{〔1〕}毛思诚所编年谱中，引有数例，意在彰显少年蒋介石的特异非凡，然而字里行间仍可见微知著：四岁时以箸探喉，以至晕绝，经医救治始苏。五岁时，缸中捞冰，不慎倒置缸底，几至冻死。六岁时，溪中野泳，险至淹毙。十三岁时，百般戏马，马怒号猛冲，受伤仆地。父亲去世后，没有严父的管教，蒋的顽劣有增无减。蒋母本来期望儿子成家后有所收敛，无奈婚后顽劣未改。十六岁时，授业于毛思诚。毛在年谱中这样描述：“其戏嬉也，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2〕}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

蒋在《王太夫人事略》中声称：“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人有尼之者，先妣则深为嘉许，筹集资斧，力促就道。”^{〔3〕}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形有出入。“年十八”是1904年。蒋第一次到日本是1906年4月，但同年底就回国了。除“年十八”的时间有误外，关键的一点是，蒋母对其出洋留学的态度，到底是“深为嘉许”，还是反对？若干年后蒋回忆此事时，说了实话：当时亲友阻力很大，母亲也不同意，“但事即至此，知余之决心难以挽回，亦只有筹凑经费，允余出洋，以成余志也。”^{〔4〕}也就是说，深知儿子性格的蒋母是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勉强同意儿子出洋的。

蒋赴日数月即返，于翌年夏间赴保定，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此事在乡民的记忆中，完全是违逆母命的行为。母亲上次反对，是不忍儿子远离，这次反对，是不愿儿子学军事。蒋寻思无计，背着母亲离

〔1〕《蒋介石评传》，（上），第7页。

〔2〕《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9页。

〔3〕《王太夫人事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一，第43页。

〔4〕《蒋介石日记》，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

家出走。^{〔1〕}母亲伤心欲绝。蒋后来常常回忆：“尝忆廿一岁，余首次在保定军校而未能假归度年，家中惟母妻二人，未见其孤子在家，乃号泣悲伤乃至不忍食年夜饭，想见当时，先慈念儿之情景，更不忍为怀矣。”^{〔2〕}

母亲去世以后，蒋常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性情“凶暴”，任性使气，说由于自己对母亲“不顺”，气得母亲致病，悔恨莫及。^{〔3〕}

除了顽劣任性对母亲“不顺”外，在婚姻家庭方面，蒋也自感对母亲“不孝”。蒋介石十五岁时，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大自己五岁的毛福梅结婚。蒋母之所以要让蒋“早为完娶”，主要基于蒋氏家族“门祚式微”的考虑。^{〔4〕}蒋介石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其中一房“断子”，一房“绝孙”。蒋介石祖父一支虽然传承下来，但也人丁不旺。蒋介石有一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还有一同父同母的弟弟蒋瑞青。但哥哥过继给了堂伯父，弟弟四岁就夭折了。蒋介石自称“中正独奉玉表公（蒋的祖父蒋玉表——作者注）祭祀”。也就是说，蒋介石是其祖父、父亲唯一的香火传人。蒋母让他早为完娶，无疑希望早抱孙子，多抱孙子，使蒋家人丁兴旺。但蒋毛婚后八年才生经国，令盼孙心切的母亲望眼欲穿。蒋称：“幸于二十三岁时经国产生，乃得含饴弄孙，稍宽其怀，余亦略得告慰于慈母矣。”^{〔5〕}细析蒋的用语，“幸于”、“稍宽”、“略得”三词，在在体现他这一问题上的微妙心态。

更令母亲失望的是，经国之后，毛氏再无生育。1915年纳妾姚冶诚，亦无所出。蒋母十分宠爱小儿蒋瑞青。在小儿子死去二十一年之后，蒋母不仅为其冥婚，且为之立嗣。蒋母硬逼着蒋介石将唯一的儿子经国过继给死去的弟弟。蒋介石很不情愿，但“不忍重违母命，以

〔1〕《蒋介石在溪口》，第73辑，第124页。

〔2〕《蒋介石日记》，1943年2月5日。

〔3〕《蒋介石日记》，1928年3月29日。

〔4〕《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页。

〔5〕《蒋介石日记》，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